

政財聯蘇之來年十三

冊分五第

命革化文與政財聯蘇

附
(係關用信政財外對聯蘇)

著 基 斯 芬 洛 · N 聯 蘇

譯 谷 申

行 印 社 務 服 化 文 際 國

引言

本書原名「卅年來之蘇聯財政」，顧名思義，自爲卅年來蘇聯財政制度之綜合檢討，爲聯共（布）黨在財政、經濟戰線上光輝成就之系統紀錄。

『不要忘記：如果我們在財政政策上不能有成就，則我們任何急進的改革，都必然歸於失敗。我們爲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而設想，且大舉奠定成就，實有賴於這後一任務。』（列寧全集，第廿三卷，一八頁，俄文版）蘇聯財政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底每一發展階段上都構成重要的一環。在本書中，讀者將在財政政策底發展上，自偉大十月革命，而軍事共產主義，國民經濟恢復，社會主義工業化（第一、第二、第三五年計劃，而祖國戰爭，而一直追蹤到戰後新五年計劃，將在這些基本發展階段上體會到蘇聯工人階級及勞動者怎樣在聯共（布）黨領導之下，克服困難，在最廣大的範圍上積累資金，使蘇聯在極短期間，從一個貧乏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爲富強先進的工業國。這是一個堅苦的鬥爭。

過程，而財政政策在這裏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學習蘇聯，自不能忽視這重要的一面。

本書結構，原係一論文合輯，其作者或係政府財政金融最高主管，或係參與財政金融工作的學者專家，故不僅理論上保持着列寧主義斯大林思想底應有高度，與嚴格的布爾雪維克黨性，而在卅年來實際經驗底探討上，尤爲深刻週密，完整而具體。

本書分爲下列各篇：

(一) 賈費列夫(蘇聯財政人民委員長)。蘇聯財政與社會主義建設。

(二) 果列夫(蘇聯國家銀行總管理處主席)。蘇聯銀行信用制度之發展。

(三) 樓洛迪尼可夫教授。蘇聯國家預算制度。

(四) 洛芬斯基教授。蘇維埃財政與文化革命。

(五) 馬爾亞亨。蘇聯之稅制。

(六) 法列爾。蘇聯之人民儲蓄。

(七) 賈洛賓。蘇聯對外財政信用關係。

爲及早與讀者見面，本書各篇暫時分成五分冊陸續印出。

國際文化服務社編輯部 十一月十五日。

洛芬斯基著：

蘇聯財政與文化革命

「我們的敵人不止一次說過：我們在一個不夠文化的國家裏栽植社會主義，是幹着一件欠考慮的事情。」列寧於論文化革命底必要時寫道：「但是他們不了解：我們不是從理論（一切牌照的理論）所假定的那一端開始的，不了解我們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是現時我們所面對着的文化革命底前驅。」（註）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爲我國文化革命創造了必須的前提。在革命之前，我國在文化水準上是歐洲落後國家之一。

事實上，在一九一六年，沙俄人口之七〇%都是不識字的。當時受初等與中等教育的僅有八十萬人。半數以上的學齡兒童失學。差不多四〇%的初級學校，所謂教區教學校，完全受僧侶的管轄。而實際上在地主掌握之中的地方學校，亦均處於僧侶監督之下。政府授權這些僧侶教育青年一代，以使他們盲目地服從沙皇與資產階級底統治。

（註）「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三九七頁。

「在這些學校裏，不是教育工農底青年一代，而是爲了這資產階級底利益去馴服他們。這些學校教育他們，爲資產階級造就順從的僕役，而這些僕役能夠給資產階級以利潤，同時卻不會驚擾資產階級底安靜與閒適生活。」（註）

在沙俄，亦如在剝削者統治着的一切其他國家裏，學生底基本部份，是特權階級底子弟——貴族，資產階級，富農底子弟。農村中差不多祇有富農子弟才能讀完初級學校；而其他農民子弟，則在多數情形下不能讀完，因爲他們的勞働力已爲經濟所需要。

農村中書籍缺乏，農民亦無讀書餘暇，所以農民子弟於離開學校幾年之後，便將已得的片斷知識完全忘記了。

初級教育與基本識字教育已是爲此，至於中等教育，尤以大學教育，更不是工人，貧農，中農子弟所能享受的了。況且中學與大學底數目，也是極端有限的。一九一四年，中等學校，共計一七九〇所，學生八二三〇〇〇名，大學九一所，學生一一二〇〇〇名。

一般說來，當時文化教育機關是極不充分的：一九一四年全國共有圖書館一二〇〇

（註）「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三八六頁。

○所，戲院一五三所，博物館一八〇所。

沙俄的出版事業也是貧乏得很：一九一三年共出版八五九種報紙，銷數共計二七二九〇〇〇份。按這一銷量，每人每年僅有三張報紙，其渺小可知了。

在沙皇制度奴役之下的各民族，其教育是被剝奪了。沙俄政府爲使「邊區」俄國化，禁止在學校中用民族語言授課。同時學校底數目，也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土耳其斯坦，每一四二六一人纔有一所學校，而在前彼德堡教育區每一〇二〇人有一所學校。換言之，土耳其斯坦的學校，較之鄰近首都的區域，要少一四倍。

在大部份民族區域中，識字人數，可謂鳳毛麟角。許多民族完全沒有文字，「沙皇制度有意地在各邊疆區域培植封建的壓迫，以便將羣衆控制於奴隸制度及愚昧無知之中。沙皇制度有意地將殖民份子遷移到邊區底最好地區，以便驅逐土人於最劣地區，而加強民族的衝突，沙俄制度緊縮了，有時簡直取消了地方的學校、戲院、文化機關，以便將羣衆控制於愚昧之中。」（註）

保健事業底情況，並不見好些。國家的與社會的醫藥衛生機關，爲數極少，而且分

佈異常不平衡。祇要指出：僅在中部俄羅斯的三十二省，才有地方醫藥機關。

• 一九一三年，城市中僅有九三二二三個病床，換言之，每一千人，才有三·八個病床。城市中的醫藥事業，主要是由私人醫生開辦的，勞動者是無力享受的。

農村中的情形更壞：每一千農村人口，僅有〇·四四個病床。

在農村地方，主要是由中級醫務人員——看護，對農村人口作醫藥幫助。一九一〇年，地方診所共有二六八六處，每一診所平均須服務二八〇〇〇人與一〇五村。一般的文化落後與惡劣的醫藥，助使最愚昧的巫醫，得以盛行於農村之中。

革命前的俄國與其他國家不同，它沒有衛生立法。防疫設施極為狹小；而且在實施方面也極為原始。在整個革命前俄國的領土上，共僅有二五〇名公共衛生醫師，較之現時莫斯科一地尚少二倍。

這種醫藥服務情形，特別尖銳地影響到無產階級底健康，因為無產階級是處於艱困的經濟狀況中的。實際上，僅在一七%的工廠裏設有醫院，在其餘的企業裏，工人都沒有醫院幫助。

在國家醫藥設備一般水平甚低之下，前俄羅斯帝國底民族邊區，尤其處於特別惡劣

的情況。例如在格魯吉亞，亞爾明尼亞，及阿哲拜疆，每千人僅有一、六個病床，在烏茲別克斯坦，每千人僅有〇、九個病床。在全部布利亞特，蒙古總共僅有三個醫師。在塔吉克斯坦則幾乎完全沒有醫藥機關。

結果，在革命前的俄國，疾病率很高：一九一三年內曾發生一七七次急性傳染病，每千人中便有四三四人患所謂社會病症。死亡率在每千人中達二八、六人，而在個別地區，特別在所謂「外籍人口」中，甚且超過這一數字。嬰兒在滿週歲前死亡者，每一千人中達二六六人。少數民族簡直是不斷死亡着。

國家辦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革命前的俄國是沒有的。所有關於殘廢者和無工作能力者的「救濟」問題，都是由私人與「慈善家」發動辦理。沙皇制度僅注意保障其大批的官僚。祇有在一九一二年，政府爲對工人要求表示讓步，曾被迫實施狹小的社會保險，然亦僅包括一〇%的工人，同時保險資金之六〇%，仍是由工人繳納的。至於補助金底數額，則極其微小。

革命前俄國的教育支出，僅佔國家預算之五%。預算資金之半數以上，沙皇政府用於維持行政及警察機關，法院與監獄。

列寧說：「我們的國民『教育』（請恕我用這一字）部對於其支出增加特速，竟致引爲誇耀。在國務總理與財政部長關於一九一三年度預算的說明書裏，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教育部在革命後（指一九〇五年革命——譯者）各年度中的預算數字。這一預算自一九〇七年度之四千六百萬盧布增至一九一三年度之一億三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很大：在差不多六年之中，增加了幾近三倍！

「祇是可惜這些俄國警察『秩序』或無秩序。底誇耀者忘記了：這種小得可笑的數字，在百分比率上經常是『極快地』增加着的。如果你將五個戈比價給一個僅有三個戈比的下人，他的『財產』馬上便『極快地』增加起來了：增加了一六七%！」（註）

實際上，在一九一三年度國家預算中，高等教育支出，比較皇室支出略微多一點，而普通教育支出則與內政部預算完全相等。保健支出，就絕對數字而論，微不足道（六百萬盧布），比較外交部支出，幾乎要少兩倍。

文化經費，除國家預算外，在地方預算中，亦曾加以編列，但爲數都極有限。一九一二年各城市中的教育，醫藥支出，佔各城市預算總額之四分之一強。

（註）「列寧全集」，第十六卷，四〇九頁。

地方預算對於教育醫藥的支出，比較城市要多些，——超過其預算總額底一半。

誠如列寧所指示，必須注意到「地方自治機關在文化支出上的較高比率，僅是次要支出底較大部份。何以如此呢？因為地方自治機關底主管範圍及其財政權力，仍是由那同一中央政權決定的；而且它決定軍隊應支用最大部份，而「文化」則僅能支用其極小部份。這種分配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是必然的嗎？是必然的。因為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如果資產階級不將最大部份用於保障其階級底統治，而剩下極小部份去作為文化支用，它便不能統治了。」（註）

一九一三年度國家預算及城市和地方預算合計，用於教育科學及藝術的支出，為二七六百萬盧布，佔國家，城市，及地方支出總額之七·八%。同年度，沙皇政府用以維持一般行政機關，亦即用於維持其純官僚機關的經費，比較這一支出卻多兩倍半以上。

列寧於其「論國民教育底政策」一文中，關於每一人口所得的教育經費，曾列舉許多極有趣味的數字與比較。根據這些數字，一九一三年用於俄國每一居民的教育經費，為一盧布二〇戈比。而比利時，英國及德國用於每一居民的教育經費，則為二——

三盧布，甚至三盧布五〇戈比，亦即多兩倍以上。美國於一九一〇年用於每一人口的教育經費，爲九盧布二四戈比，更較俄國多至八倍。

正以此故，列寧於論及革命前俄國國民教育狀況時，稱沙皇的教育部爲愚化部。

(註一)

列寧天才地預見到業已成熱的革命，他寫道：『如果俄國人民未能了解到必須推翻農奴主——地主底壓迫，則俄國永遠在國民教育支出上，滯留於貧乏及低落的狀態。』

(註二)

實際上，一九一七年十月，結束了俄國人民底不文化以及被壓迫。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爲我國國民教育與文化底發展，開擴了廣大的道路。『以後，整個人類思想，整個人類天才，僅是爲了將一切技術與文化底幸福給予一部份人而創造着，至於其他的人，則被剝奪了最必需的東西——教育與發展。但是現在，一切技術底奇蹟，一切文化底成就，都成爲全民所有；自今以後，人類底思想與天才，永不會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六卷，四一〇——四一二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十六卷，四一二頁。

變爲暴力底工具，剝削底工具了。」（註一）列寧底這些名言，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是完全證實了。

列寧爲文化革命這一認識，增益了深刻的內容。他強調祇有馬克斯主義的宇宙觀才是革命無產階級底利益觀點和文化底正確表現。

無產階級羣衆，農民，以及全國人民，必須在共產黨底幫助之下，把握着這一宇宙觀。但是這事情必須從頭做起。因此之故，列寧認爲必須首先使全國識字，因爲「不識字的人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首先教他認識字母。非此，即無政治；非此，只有流首，蜚語，神話，成見，卻無政治。」（註二）此外，必須實施普及的初級教育。必須以中等的，一般的技術教育，以大學教育，去造就大批工作人員，而後社會主義建設底各方面，方才有文化的幹部。

民族文化問題在列寧及斯大林學說中佔着特殊的地位。斯大林同志於其早年著作之一中寫道：「語言是發展和爭鬭底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俄國無產階級底利

（註一）「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二二五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五一頁。

益，要求俄國各民族底無產者都有全權去利用那使他們能夠最自由地獲得教育的語言。

……（註）

黨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底基本論證，在十月革命之前即已爲我國建國者與領袖——列寧與斯大林所闡明，而在黨的綱領中獲得完滿的表現。

教育方面的最主要任務，在於實施十七歲以下兒童底免費強迫教育，建立學齡前的保育機關底網，完全實施統一勞働學校底原則並用當地語言授課，對工農底自修加以全面的國家援助，對於一切願意進大學學習的人，首先對於工人，廣爲容納。

在保健方面，黨底綱領提出：爲了勞働者底利益，堅決實行廣泛的衛生措施，與社會病症爭鬥，並保證人民普遍獲得免費的優良的醫藥幫助。

在社會保障方面，黨規定不僅對於戰爭及天災底犧牲者，而且對於因社會關係失常所造成的犧牲者，組織廣泛的國家幫助；對於各種寄生主義，作堅決的爭鬥；對於每一脫離勞働常軌的人，都使其回復到勞働生活。

共產黨所宣佈的偉大原則，即是蘇維埃政權所實施的文化革命底基礎。

（註）斯大林：「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了解民族問題」，見「全集」，四四頁。

在艱難的內戰年代裏，蘇維埃政權即曾爲提高文化而鬭爭，雖然當時一切物質與財政資源，都用於反對白黨軍隊及外國干涉的戰爭，但是教育，保健及社會保障等預算，仍列支大宗經費。

例如，一九一八年度國家預算列支教育經費二九七五百萬盧布，保健，社會保障及勞働保護經費一四〇二百萬盧布。一九一九年度，這類經費復增至教育：——一七二一百萬盧布，保健、社會保障及勞働保護：——二五一五五百萬盧布；而一九二〇年度更增至教育：——一四三六六百萬盧布，保健、社會保障及勞働保護：——一五五三五〇百萬盧布。社會文化設施支出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度預算中所佔比重，爲六·五%，而在一九二〇年度預算中，其比重激增至二二·五%。

如此巨額的社會文化設施經費底支出，使社會文化機關底網，在蘇維埃政權進行武裝鬥爭的年代裏，即已能夠廣泛敷設起來。

在國內戰爭終了之際，即在一九二〇——二一年時，初級學校底數目，與一九一四年相較，增加了九六二五所，中等學校增加了二三六三所，職工學校增加了八五〇所，大學增加了一四三所。在這一時期之中，初級學校學生底數目差不多增加了二百萬人。

同時，又實行了許多革命前所沒有的文化設施：組織了掃除文盲站，爲識字不多的人設立了學校，成立了書報閱覽室，工人大學，共產主義大學，蘇維埃黨校，社會主義文化宮。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對於產生愚昧的文盲，開始了堅決的爭鬥。在國內戰爭期間，組織了四萬一千處掃除文盲站及識字不多的人底學校，在這兩種學校中讀書的勞働者達一百一十五萬人以上，成立了二萬五千所書報閱覽室，八千五百所文化宮與俱樂部。同時，創造了造就勞働者取得高等教育的嶄新形式——工人專科大學。一九二〇——二一年度共有五四所工人專科大學，學生一萬八千名；六四所共產主義大學與蘇維埃黨校，學生七千名；七八〇所工人大學，普遍教育學校與成年人短期學校，學生五萬三千名。

國內戰爭時期蘇維埃政權，在保健方面的基本任務，是與瘟疫爭鬥，並對紅軍作醫藥衛生服務。蘇維埃的保健事業及其廣泛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措施底基礎，便是在這時建立起來的。

在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府立即確定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四日）蘇維埃社會

保險制度底基礎。社會保險制度推行及於所有工人及城市和鄉村的貧民，而且包括着喪失勞働力的一切形態。一切保險支出，完全由企業主負擔。工人和職員於喪失勞働能力和失業時，取得其全部的工資。

一年之後，因為物品底集中直接分配與經濟底物品化，社會保險制度遂在新的基礎上重新予以改造。一九一八年十月，勞働者社會保障條例通過，根據這一條例社會保障制度適用於所有以自己的勞働為生活來源的人們，亦即不僅適用於工人及職員，而且適用於勞働農民，手工業者。社會保障制實行醫藥幫助，付給養老金，補助金，和支給實物。

在國內戰爭結束後，蘇維埃政權以堅決改善勞働者底社會文化服務為其最迫切的任務，這一事實立即表現於國家及地方預算用於這類目的經費底日益增加。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及社會主義工業化底兩年之中，教育支出底增加，有如下表：（以百萬盧布為單位）

年	度蘇聯及各共和國預算地方預算	計
一九二一—二二	五七·七	一一三·二
	五五·四	